

的层次,就是说,战争在思想层面上还未得到处理或处理得不充分,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我觉得将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加以重合处理的方法,可以发挥相当的有效性。现在,大概到了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限定方法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九六〇年运动的共通体验。我认为,将此视为战争体验的果实,由此回溯战争体验,这种方法大概是可能的,不仅可能,恐怕也是必要的。我们应该着手于方法的探索,不如此则这次真的要使战争体验流失掉,我们甚至可能会因旧态复萌而无可避免地成为自然主义的俘虏。六〇年的体验,可以理解为是本应该在战争中产生的经验推迟了十五年才发生。这本该是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时期应有的抵抗的类型。这反过来又说明日本直到一九六〇年为止,战争都没有结束。战争体验一直持续着。这种思想上的操作,只要脱离自然主义的宿命论,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借助于这种思想上的操作,我们可以填充代沟,也可以反过来抓住克服自然主义的契机。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 亚洲的进步与反动

——参照日本的思想状况

“反动”这个词带有价值判断和感情的色彩。说“那家伙反动”时,这反动里包含着顽固、不通事理、陈旧等语意。有时还让人联想到不可理喻的暴力性。一般的人大抵讨厌被人说成“反动”。很多人都觉得保守还可以忍耐,反动则实在受不了,别的都可以,就是不想让人说成反动。当然,其中也不是没有自称“我反动呀”的人,不过,这种突然改变姿态的做法乃是一种反守为攻指称对方的“进步”为假的策略手段,并非真心认为自己是反动。

有“保守反动”这个套话,保守和反动联合像一对亲戚似的,据说这个说法植根于日本特殊的风土:在这一风土中,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法在知识人中间得到普及而庸俗化。应该说这个说法体现了一种误解,保守和反动乃是不相干的两件事。保守与反动不同,有贬义同时也含有褒义。在生活方式或美学意识上,自豪地称自己为保守的,大有人在。

反动被视为坏东西,但什么是反动呢?如果有人要求你下定义则很麻烦。在这个月中,我翻了好多书,看了好些人的解释,可还是有些不得要领。粗粗一想好像懂了,认真一追究,却又不明白了。所以,这篇稿子说真的不应该现在动笔,只是到了交稿的期限,不得不写罢了。

与反动成对儿的概念是进步。反动被视为恶,在于有视进步为善的思考方法存在。可是,进步有与其相反的概念退步,故进步为好退步为恶应该是常识了。然而不然,进步与退步可以用于说明人类,通常却很少用于解释历史,作为替代使用进步与反动这一范畴。在历史方面进步是善的,反动则是恶。这种认识大概来自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单线向前发展的思考方法。根本上有一种历史本来是不断进步的信仰,因而,产生了束缚进步的东西就是恶这样的想法。

可是,反动另有一层涵义,而且在起源上这另一层涵义恐怕更为古老。这就是力学意义上的就动而言的反动,即就作用而言的反作用。因此与运动相关,而不含有价值判断意识。当人们不把历史视为等质时间的流动,而是认为在其内部有力在起作用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动而言的反动这种认识方式就会出现。中国自古有“一乱一治”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好地表达了中国人历史意识的词语,就是说中国人的历史观是以循环为基础的。有治则必乱,战争结束了和平就会到来。治与乱相互交替。如果站在运动的立场上观察,治为动则乱就成了反动,乱为动则治又成了反动。从因果关系上讲,治的结果是乱,乱的结果又成了治。因为力的作用产生反动。仅有一方,反动是不会产生的。

动与反动在力学上是等量的。动越大则反动亦大,反之亦

然。大概用力学来思考历史是不成的,但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变化,变化来自运动,则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力学(古典力学)的法则吧。变化较小的情况下,即运动的量相对较小的场合,作用力也较小,因而反动也就不大,反之亦然。

应该说推动历史的力量内在于历史之中吧。这样,这种推动力量就要归结为人类的集团(复数)意志。人类的集团其内部也很复杂,集团与集团之间亦有一种复杂的力量关系在发挥作用。有时A集团的意志压倒了B集团的意志,于是在B集团里就会产生出反弹的力量来。我想这可以用来说明反动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说的集团,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民族,或者是两者的合成。总之,我们应对下面的论点予以承认:一个是对于反动而言有应成为其原因的动之作用,另一个是运动量相对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动——至少反动会变得显著。

看看历史上反动一词的用法,可以发现,有的时候指某个时代某种体制,有的时候指人类集团或其代表人物,有的时候指运动本身,我觉得不论指哪个意思,都适合于上述法则(?)的。比如,称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神圣同盟,及随后而来的时代为反动时期,这是指某个时代某种体制。其代表人物是梅特涅。法国大革命后的热月反动则指某种运动。俄国革命时期的所谓斯托雷平反动兼有人类集团和运动的两方面意思。战争和革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运动的量巨大,变化的幅度也大。可以说为此其反动也表现得尤为显著。

仅仅观察一下上述实例就可以知道,历史上一般所说的反动都不单是反作用的意思,其中还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意味。粗略地说,可以称之为逆流。历史要向某个方向行进,阻止其行进或者试图返回原初状态的运动,推动这种运动的势力以及实现

运动的某个时期被称之为反动。

在亚洲寻找同样的实例,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事例:日本明治维新反动的实例是西南战争,在中国辛亥反动的实例是袁世凯的恢复帝制计划以及张勋复辟事件等。历史学家们称这些为反动。在这些实例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是由贵族和封建官僚所发起的复古运动,而且,这些运动最终都没有成功,也是一致的。

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反动不曾存在过。反动曾经发生,但是还有一种将这些反动推倒的力量存在,故历史得以保持其一贯性。在法国有七月革命,俄国有十月革命,中国则在其后发生了国民革命。日本的情况更为复杂,革命的性质不同,革命与反革命的交替方式也不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革命的胜利形成了明治国家,因此不能与上述国家的实例放在同一个系列里类比。但至少就明治国家体制得到了强化,成了既成事实这一点来说,镇压西南战争的功绩是可以大言特言的。总之,激烈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反动,可以说这几乎是一条法则。战后的日本也不例外。

在日本,伴随着战败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从某种观点上可以说,是与明治维新相匹敌的变革。因此,当然要引起反动。这种反动现在还在行进之中,或者处在停滞的状态,或者已经变质倒退?总让人觉得缺少一个整体轮廓,也看不清楚发展的方向。但是,许多人在一九五〇年前后,实际感受到这种反动之不小的重压则是无可怀疑的。当时,猪木正道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我们看看其中的一节:

a 可不是,日本自身内部有着反动化的原因。不过,

无论哪种革命都必会有反动到来的。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亦有王朝复古,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也是一样吗?我最近读布林顿(Bringhtor)《革命的解剖》,知道哪里的革命都免不了有热月政变。

b 问题就在这儿,热月政变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的政变。布林顿也指出,热月政变的特征在于被革命所放逐或处罚的那帮人获得了赦免,满不在乎地回来,就是说解除放逐,还有革命高潮中抖威风很潇洒的家伙们遭到了镇压,即清洗赤色分子。而且,这里都是有顺序的,解除放逐是从左向右进行的。就清教徒革命的情况而言,一六五三年首先是长老派复归,不久主教派也回来了,最后是查理二世复政。法国革命也是如此,雅各宾右派,吉伦特派,费扬派渐渐复活,接着来了拉法耶特派,王党派,最后是波旁王朝的归来。在日本,顺序也一定是这样的。正如布林顿先生指出的那样:解除了放逐的那些家伙们哪里是“什么也不忘,什么也不学”,他们简直是“大事全忘掉,只学无聊事”便回来了。清洗则大有从极左开始渐渐及于自由主义者的危险。还有,原来的教会之复活(日本则是国家神道),享乐之风盛行,这些都完全适合今日日本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刚才所说,日本的现状不用说也是一种热月政变。不过问题是政变要走到哪里去。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葬送于光荣革命,在法国波旁王朝被七月革命所摧毁。就是说,在英国和法国,还是有制伏反动的力量的。日本是否有这种力量则很成问题。很遗憾我觉得没有。因此,反动来得迅速而猛烈。而且,扼制反动的力量很脆弱。 (“反动问答”,《日本的方向》九

这里,猪木是以民主主义为进步的指标来看反动的。我觉得选择民主主义为指标,以及对于民主主义内容的理解,恐怕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暂且不提。总之,作为揭示了反动的运动法则,这篇文章让人觉得信服,我觉得很有意思。

姑且不论以什么为指标,当认为历史单纯地沿着进步的方向发展这种思考方法、即进步史观成为根本立脚点的时候,对于反动的把握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反动内含着非价值性的、力学运动的侧面,即使在对反动进行价值判断的情况下,这一力学的侧面也仍然足以在事件内部生存,并得到维持。从以上的事例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反动的涵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还是在它成为与进步相对的概念之后。进步史观形成于近代欧洲。最早出现于启蒙时代(孔多塞等人),这种进步史观一方面吸取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融入了自然科学的发达状况,最后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对指标的选取也不仅仅局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这一点,还摄取了自由、平等,以及民族、社会的财富生产和分配,大众解放等等不同的要素,变得越发复杂。马克思的历史观并非单纯的进步主义,还包含着实证主义等要素,甚至与基督教的末世观也并非毫无关系,这里就不做细致的分析了。至少在日本所移植的马克思主义中,进步史观的侧面得到了强调,甚至可以说进步的观念几乎由马克思主义所独占了,其理由及妥当与否暂且不论,我觉得让马克思主义代表进步史观,也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妨承认,这只不过是当初体现为理性文明之类的进步观念,为社会发展的观念所取代了而已,而对进步的强烈信仰却是一以贯之地得到承续的。

进步史观产生于近代欧洲,故在导入这个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速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因此,这里所提及意义上的反动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说到亚洲固有的历史观,主要有前面提到的儒教性格的循环史观,还有佛教的末世思想,说到日本则有神国史观,等等。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上世纪末,一般认为康有为是其代表。的确,在康有为那里有这样一种内在的价值转换,而且可以感到他对此是有着自觉意识的。他所依据的是中国古典中有关“大同”的记述。所谓“大同”乃完全不存在差别的世界,而以往的古典学者站在末世思想和尚古主义的立场,视“大同”为人智未开的远古世界。康有为则将大同反向定位,视其为投向未来的乌托邦,并认为只有这种解释才符合孔子的真实精神。就是说,孔子不过是把理想假托于古代而已。这无疑是儒教世界观中的哥白尼学说。大概是面对清末社会的混乱,士大夫的危机意识,还有以进化论为中心的西欧科学思想的压力,从内外两方面促使他走向了这种思想冒险的吧。因此,他和哥白尼一样未能幸免于迫害。康有为本人后来在革命的过程中走向了反动,但是,他在精神领域的贡献对革命运动来说是永不泯灭的。

在日本,我认为这样的价值转换,至少作为明显的例子不曾存在过。诚然明治维新以后历史学十分繁荣发达,但与其他所有近代科学一样,那是以已完成的形态引进的东西所具有的繁荣发达。实证主义、进步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如此。神国史观仅仅是被驱赶到角落里,未曾经过思想的交锋,因此也未曾经历内在的转化。神国史观受到学者的轻视,却在平民当中以便于为权力利用的形式不断延续。

我现在在此所涉及的问题,上升到普遍意义的层面,可以归结为近代化方式中的日本模式与中国——广而言之是整个亚洲——模式的差异。我认为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可以阐明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整个生活领域。不过,在此我并不是要处理这样重大的问题,我只想就进步与反动的问题继续做些叙述。简要地讲,就是进步这个思考方法本来不曾存在(同时,事实也不曾有过),是从西洋引进的。这一点在整个亚洲是共同的。不过,在引进方式上日本和中国有所不同。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因此,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对进步的思考方法不是也会有所不同吗?从而,对反动的思考也会相应地不同吧?

我当然知道,这篇文章被要求分析的问题是,结合实际状态把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作为思想课题加以阐明。但是,作为进入这个问题的必要程序,我不能不对进步与反动之思考方法中暗含的日本特性进行反省。不如此,我便总是觉得脚下不稳无法安心。我无法对“那家伙是进步派”“我就是反动呀”等信口开河的话充耳不闻。我们不能任凭日本战后的反动轨迹被不明不白地束之高阁,而对他人的反动高谈阔论。我们所认为进步者真是普遍性的进步吗?我们所认为反动者真是普遍性的反动吗?我对此抱有怀疑。

上面以实例提到的在历史学家之间已成定论的反动,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并涉及到晚近的事件时,评价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说二十世纪最大的反动是法西斯主义。这一规定本身无可置疑,可是法西斯主义是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乃至思想,其实际状态还很模糊,不仅全貌很难把握,就是在处理法西斯主义各阶段或具体表现的复杂力量关系时,我亦痛感自己的方法之无力。法西斯主义不仅存在于欧洲,

而且在亚洲也有发生,更重要的是直到最近我们还处在其漩涡之中。要绕开这种直接的体验而谈反动,在我是做不到的。坦率地说,对于“进步”与“反动”这两个词语语感中反讽的韵味,我自己也多少有些共鸣。

在动笔的时候,我原来的打算是,为了弄清楚问题的所在,先阐明概念的边界,然后进入对内容的分析,但进展得并不顺利。结果又回到日本进步观念的特殊性这一出发点上来了。下面,我改变一下角度,重新再做一次尝试。不过,在此我先要就西欧进步观念的终结补充几句没有来得及说的内容。

进步观念本身到了二十世纪初也出现了危机,发生了变质,出现了进步的怀疑。反动的思想则与思想的反动化密切相关。所以,进步观念的混乱不单单是日本的特殊问题,可以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把日本的特殊性还原到普遍性上去的做法。不过,关于这一点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 二

如前所述,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亚洲——特别是东亚——的进步与反动的实际状态,及其思想意义。今日之进步与反动的势力分布是怎样的?具有什么历史背景和怎样的思想内容?将来会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完全阐明,至少也想思考一下阐明问题的线索。为此要对进步与反动做出初步的定义,以上便是我颇为烦琐的梳理。不过,由于问题的梳理不尽人意,下面我将改变方法从别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再做思考。

如果假定历史的进步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而这个共产主义又要经历同质(而非均等)的过程,那么,进步与反动的区别则相对容易些。以国家为单位来讲,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接近共产主义的国家是进步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则可以划入反动的阵营。就集团或者个人论,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是进步派,反对共产主义者则为反动。

东亚各国在政治上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国那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另一个是印度和缅甸那样的中立国家,第三个是泰国及菲律宾那样的反共国家。朝鲜和越南则国家由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分为二。中国亦包含着反共的台湾政权。这是体制间的对立亚洲的反映,同时这也是前述的法则——反动伴随激进的运动而出现——的具体实例。从日本战后的经验来讲,共产党的运动之尖锐化时期与反动立法的时期正相对应。

在东亚,还有其他如日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等等国家,除去日本,其他国家都可以分别归属于以上三个群体中的某一个。只有日本,虽可以勉强地划分到反共群体中去,但正如人们称其为亚洲中的西洋或亚洲的孤儿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历史上,日本都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将在后面论及。

反共国家也好反共政权也好,虽然存在着程度上的差距,但大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如标举反共亲美政策,并且实行它;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在领土内建立他国的军事基地同时拥有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军队,政权的独裁化倾向鲜明,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受到压制等等。如此看来,从常识上考虑,这些国家或政权应该说也是具备了反动的条件的。一般日本人会在感觉上承认,即使不使用反共等于反动的指标来衡量,仅从自由主义的前提来看,说这些国家是明显反动的也是成立的。不用说,虽然政

权具有反动的性格,但这不等于说其国民也是反动的。这一点即使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也是相同的,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我只是想要指出,如果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结果就会是这样的。

这些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各国的入侵(这本身是战争的目的,还是为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这个问题暂且不论),由此激发起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而由于日本的战败,民族主义运动演化为殖民地独立运动,同时因为殖民地性格的不同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东亚诸国以不同的形式建立起独立国家。由于如此复杂的条件,结果就形成了上述三种国家或政权的类型与特征。

在此,让我们看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现在,那种认为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殖民地的正义战争的观点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不过,日本的侵略战争激励了本土自发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给独立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机遇,这种不期然的另一面影响是不能否定的。直到战败,日本被称为亚洲帝国主义的尖兵、反动的大本营,事实也是如此。刚才所列举的反共政权的共同特征,除了依靠美国这一点外,其他的特征也是战败之前的日本所具有的特征。以单纯的图式加以比较,也可以认为战前的日本所承担的东亚角色,在战后分化成多个角色。而且,由于分化的结果其作用也相对减弱了。无论哪个反共政权,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都很难维持,其中亦有像几年前的越南保大(阮永瑞)政权那种明显的傀儡。再一次依靠单纯的图式分析,我们并不难以判断,战前日本的角色为美国所代替,日本一手促成的傀儡政权及支持过的小型反动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在今天则由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个更大一点的反动政权所接替了。

这一事实有助于确立反共等于反动的分析指标。的确,这样一来,作为一种思考方法很明快,说明起来干脆利落。世界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由于革命形势越发紧迫,日本那样的处于中间位置的法西斯主义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变为由美帝国主义从正面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这样一种格局,这种说法也可以大致说得通,亦有很多有利于这种说法确立的证据。例如,不管哪个反共政权,若除掉其反共的招牌则没有共同的思想,因此,甚至美国欲将东南亚条约组织扩大到东亚全体的意图至今亦未能实现。

但是,说明的干脆利落也可以认为起因于指标的单纯,因此,若用别的单纯指标,即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说明,当获得大致同样明快的解释。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说,共产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都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按照西欧的进步观念衡量乃是一种异端,因此也就是反动。于是反共政权的反动性可以用民主主义的不成熟来说明。反映这种思考方法的适当例子是,同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的词语被使用在内容完全不同的“波茨坦宣言”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sup>①</sup>里。反法西斯战争阶段的主要敌人,在新的阶段变成另外的对象,而关于敌人的定义,在思想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当然,接受“波茨坦宣言”的

<sup>①</sup> “波茨坦宣言”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起草发表的对日宣言。该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彻底清除军国主义,解除武装,保障基本人权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于一九五一年,由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缔结。由于旧金山和会是以美英为主的太平洋战争参与国与日本之间的单方面和谈,以共产党中国为首的亚洲战争受害国在战后并没有达成与日本的和解。“日美安保条约”规定了美军为了保障日本的安全继续驻留日本,并设立军事基地。在此条约里,日本变成了被保护对象,而假想敌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苏联与中国。下文所说的在“波茨坦宣言”和“安保条约”签署人为同一负责人,亦指这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思维逻辑。

负责人同时也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字人,这种违反常识的勾当实在有些过分,但是,在强迫这样做的一方来看,其逻辑却是一贯的。

当下的反动,当然绕开意识形态是无法论述。正如历史上的反动一样,能得到众人一致认可的讨论很是困难。假如过了一百年之后回头来看现在,或许可以辨明个中是非,可是我们不能中断思考干等到百年之后。我认为,无论是坐等历史的审判还是任凭意识形态的摆布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不负责任,与侵略者在宣布放弃侵略后不久,又马上跟人约定说咱们一起侵略吧这种不负责任是不相上下的。意识形态问题无法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但也不能因此把它视为安身立命之物,意识形态是应该加以掌控的对象。我前面已经说过,今天进步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动摇,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意识形态不正当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

对发生动摇的进步观念,是否能够重新设计?是否应该重新设计呢?如果这样做有利于作为事实的进步——人类幸福,我想就应该去做。但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十足的确信。我认为与其以历史为主线来思考进步与反动,不如以人为主线来思考进步与退步更好。当然,即使为了这个目标,尊重历史积累下来的进步因素,可能的话致力于重建信仰,这也是过渡性的必要步骤。如果连这种必要性也否定掉的话,那么,这与其说是思想的反动,不如说是对思想的放弃。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被意识形态所僵化了的进步这个观念,使之变得更加适应今天的事态。进步观念是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当然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而得到改变。怎么改变呢?由于将指标单纯化了,故意识形态上的评价发生了分裂,因此,

确立有包容性的复数指标便成了惟一的拯救途径。如果不如此,我们将无法解除意识形态的武装。

有很多人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指标,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这里介绍一下丸山真男的意见。这是他在载于创文社刊行的《现代史讲座》别卷的共同讨论《世界史中的现代》中的发言。参加讨论者除了丸山以外,还有上原专禄、竹山道雄、林健太郎、务台理作、铃木成高、都留重人(这只是第二分会的参加者)诸位。丸山真男说:

我想现在我们的讨论已经到了可以做总结的阶段,作为事实的世界史的倾向,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不同,我们必须承认的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暂且可以说,下面三个因素是不能不承认的:第一是技术的进步,第二是大众的兴起,第三是亚洲民族主义,这些并行的现象不论站在什么意识形态的立场都是无法否定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三个要素都不得不承认,我觉得这三个要素未必可以无所限定地作为进步而礼赞。即使是亚洲的民族主义中,亦有可能走向超国家主义的因素。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所谓这三种倾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之作为事实是不能不承认的。如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无论对这三种社会的历史的倾向中的哪一种,如果政权试图把它回归过去或者阻止其发展,那么,这种权力即使兴隆一时最终也难以长久持续。以这三个标志来衡量现代意识形态,例如甘地主义以大众的兴起和亚洲的勃兴这两个契机为背景,显示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但不承认另一个因素,即技

术发展的不可避免性,而带有否定机械讴歌原始生产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有其政治上的局限。相反,欧洲的社会主义既容许技术的发达也承认大众的兴起,但因为长期以来的传统难以舍弃殖民地统治上的国家利益,故显示出难以正视亚洲民族主义的致命缺欠。英国的劳动党和法国的社会党情况便是如此。说到底,我们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权力,能够承认这三种事实的不可逆性格、肯定它们,同时又能够把握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不使其中的一方吞没其他方面,不断保持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同书二〇九——二一〇页)

这段发言并没有得到哪个与会者的积极赞成或者反对,便转到其他话题上去了,不过参照讨论的整个过程来看,就从意识形态的僵化中解放出来,为此有必要承认价值的多元化这一点来说,我感到全体与会者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而关于丸山所选择的指标,乃是作为对到此为止的讨论所做的总结提出的,大家基本上没有异议,不过,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于此,还是出现了一些修正意见。对此,提议者本人亦很宽容,正如发言开头强调的“暂且”那样,是事先就准备了接受修正的余地的。所以,我不想针对这一提议进行讨论,只想就多元化地设定指标这一问题本身做些思考。

确实,我觉得这样做对整理进步观念的混乱状态是有效的,选择指标的方针也很实际。我甚至在提议者有意选择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用语,以及把亚洲的民族主义作为独立的一项而提出这些地方,感受到了他的良苦用心。这种周到的考虑,在日本式进步主义横行的精神风土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日本



式进步主义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左还是右,都把像背诵咒文一样背诵各自不同的特殊用语的能力集中运用于进步的指标。

如果把共产主义视为进步的惟一指标来选择,那么,对亚洲的民族主义很难进行独立评价。假如认为这是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可以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假如这是最终走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只能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为止的历史,也会看到评价始终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有时把甘地和孙文视为反动,有时则视为民族英雄。这与其说是顺应情况的变化改变价值标准,不如说由于价值标准只有一个故只好论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不承认亚洲的民族主义具有独立的价值,则难以突破这个难关,同时,为此不得不改变进步的指标。我们可以视中国共产党对矛盾论所做的理论发展为这种努力的表现。

还有一个难关。如果把共产主义视为进步的惟一指标,最终在逻辑上只有战争与革命之二者择一的选择,而今天在原理上战争已经成为不可能,因此革命在原理上也成了不可能之事。如前所述,不伴随反动的进步,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共产主义者空想着不伴随反革命的革命,那不过单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

这样看来,指标的多样化,至少是这样的设想,对防止理论的荒芜是绝对必要的。在此,我只把共产主义的进步史观作为讨论的对象,是因为我认为在日本这是进步史观的代表,同样的情况,如果是单一指标的进步史观,恐怕都可以适用。

那么,丸山的建议可以完全接受吗?对此我多少有些疑问。这里,他所提出的三个指标(数量和内容都可以变更)是作为同质的数量上可以比较的东西来处理的。从他的关于并行现象的

说法,相互可以取得平衡的看法里,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引申欧洲进步的观念而得出的有意对应现状的折衷方案。我认为亚洲的民族主义,或者其深处所流淌着的亚洲式情绪,乃是更为异质性的东西,不适合使用并行现象这种处理方式。这不是可以成为进步指标的东西,相反是更本源的,能够检验进步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

这个建议中体现出来的丸山观点的弱点以及促使我想到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从这样的设计中恐怕很难有革命的契机“现在性”地产生出来。在亚洲革命比起理论来更是一个实际进行着的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包含革命契机的理论,这个理论将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当然,如前所述,那种无意义地助长反动力量的共产主义进步观是无济于事的,但为了纠正这种弱点,反过来又认定渐进的进步才是惟一的进步,这也不能适合亚洲的现状。

另一个问题与这第一点相关联,即日本人之民族使命感是否因而被抛弃的问题,诚然,日本曾经是亚洲的反动巨头,而且培养小型反动势力,用自己的手制造了若干小反动。反动会带动反动。甚至越是小型的,反动化的倾向就越强烈。现在东亚反共政权的分布中,有相当一部分继承了日本的遗产。但是,如同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日本的反动化在另一方面,即使不能说起了助长的作用,至少可以说充当了诱发亚洲民族运动的契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情况不可笼统而论,故在朝鲜、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西亚之间是有差距的。总体说来,相隔距离越近憎恶感越深,因此同化力量越在发挥作用,相隔距离越远则亲密感增多的同时,缘分也就不够深厚。在这一意义的极限状态上看,日俄战争和大东亚战争的距离接近于零。据说战后,

去缅甸旅行的日本人听缅甸人说日本“不是东西”，于是慌慌张张地对发动战争表示谢罪，可是，对方其实是因为日本没有招呼自己去参加对英国的战争，才指责日本人“不是东西”的。这个逸闻正象征着日本在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关系上所起作用的复杂性。

今天，多数日本人都感到兴无名之师发起非正义战争的屈辱。因是无义之战，故亲人之“英灵”无法得到拯救，因此自己也难得拯救。从战争中“什么也没学到”便可以转向进步，这只有“进步的文化人”可以做到，可是我无法做到。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反动化的思想温床。而且，只就国内条件来考虑的话，则激进化越发展反动化也越深化。参照前面所述有关反动的法则，不难看到这一点。在日本如果渐进的进步可以得到保证的话，丸山的命题在实践上会有效果，不过如上所述，猪木之说在这一点上是悲观的。

即使强调现在日本应该与亚洲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但无视昔日的民族使命感，将很难发现相结合的道路吧。日本人的民族使命观曾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结为一体不可分离。怎样才能区分开来？从哪里加以区分？如果不能区别开来，民族使命感就不会得到充实。那么，我们通过清理进步观念的混乱，确立起新的指标，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我感到怀疑。

讨论到这个程度，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是进步、相应的什么是反动，这个最初的出发点上来了。而且，从亚洲的立场出发重新对此加以思考的必要性也呈现出来了。亚洲的进步是什么？将其视为与西欧的进步相同的东西是否合适？日本蹈袭西欧的进步而成了亚洲的反动势力。是否应该将此理解为在进步过程中转化为反动（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持这种说法）？这样

理解的话，民族使命感的一贯性将要丧失。如果要保持这种一贯性，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性（这正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想法），要么溯本求源，从根本上把对进步与反动的评价颠倒过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选择哪一种呢？如果要我直截了当地说出结论来，我当然是选择后者的。

### 三

终于到了可以窥见问题的关键之处，然而，时间、篇幅和我的思考能力也达到了临界点。所以，下面我将不再做逻辑的展开，只就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点以提纲的形式开陈于此。

一，对于上引丸山的建议，如关于对甘地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讨论中上原专禄表述了有节制的反对意见，这对我很有启发。例如，对甘地主义的评价，他联系中国革命做了如下叙述：

……比如说中共的革命。中共的革命，在理论上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革命的行进氛围中却有着某种古老中国的传统精神气质存在。……接下来是印度的甘地主义。……的确，他们并没有致力于科学技术，不过，这是否只具有负面的意义呢？对于科学技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本身就没有积极的意义吗？我感到在甘地主义对科学技术嗤之以鼻之处，其实是颇有意味的。这种态度其实在印度教传统中是古已有之的氛围，这种氛围在大众中被重新唤起并且富有生命力地复活下去。要是按照近代主义的观点，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的作法，但实际上它也同时具有

着非常伟大的力量吧。我不认为古老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应用于现在,不过,如果说人类的危机意味着西欧近代走进了死胡同,那么,在与近代主义没有直接关涉的地方存在着亚洲传统,难道不是可以在现代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吗?甘地主义所具有的朴素的正义观,及中共革命行进中所展现出来的古朴人道主义,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二二五页)

在日本的思想家中,上原是有意识从心理情绪方面来关注亚洲民族主义的,如他在讨论中曾这样感慨道:“我尽管一直期望尽可能脱离西欧式的思考方法以获得思想的自由,可最终还是采用了西欧式的思考方式。”(一八九页,同样的感慨还见于《思想》杂志一九五七年五月号,历史专集的对谈中)在这次讨论中,他还透露了这样的想法:“我无论如何不期望那种众人信服的惟一的思想体系,或者什么思想流行的发生。我想即使不搞那一套,也是可以行得通的。我总觉得,好像印度人或中国人具有这样的自信。”(二八二——二八三页)接下来,他对亚洲的民族主义做出规定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我们在思考“民族主义”这一词语的意义,思考它的实体和内容时,总是不自觉地发生一种倾向,即追随欧洲人在思考欧洲历史事实时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比皆是,这实在是奇怪得很。我觉得这种奇怪现象,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方式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中,本来存在着相对于欧洲的制度与文化,要获得主体性和自律性

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可是偏偏又要像欧洲人那样来理解“民族主义”这一词语,这实在是一种反讽性质的自相矛盾。说到“民族主义”,人们可能会认为,在亚洲或者非洲,真的存在一种“国家的”或者“民族的”东西,而针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强调着自己的存在。但是,这种理解方式是非常欧洲式的,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符合亚洲或者非洲的实际情况。(七四——七五页)

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恐怕也是可以置换为“进步”的吧。

二,近代欧洲入侵亚洲,使古老的亚洲解体,从而在亚洲内部引起内发式变革,这一历史事实难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入者独占了代表进步的专利,那么对它的抵抗当然不得不以否定进步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抵抗能够被称为“反动”么?许多被视为亚洲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证据的历史事件,难道没有从这样的疑问出发进行再评价的必要吗?例如,太平天国是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可是从反面来说,这又是取代清朝而试图建立新王朝的复古运动。同样,一八五七年印度的印兵大起义曾经试图复兴莫卧儿王朝。而义和团的反动性格则是众所周知的。

三,这一点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也是一样。比如,鲁迅与林语堂的费尔泼赖论争(鲁迅《论费尔泼赖应当缓行》,参见《鲁迅选集》第五卷,岩波书店版),反对费尔泼赖的鲁迅,就这一点而言,是反动的。

四,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黑龙会、玄洋社,最后追溯到西南战争的反革命巨头西乡隆盛。从进步的立场出

发,西乡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反动将遭到否定(如诺曼《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但这又与国民感情相背驰。

五,冈仓天心所谓“西欧的光荣便是亚洲的屈辱”,作为历史事实,毋宁说其悲惨的结果是“日本的光荣便是亚洲的屈辱”。尽管如此,冈仓天心的话乃具有超越他自己意图之真理性。

六,进步与反动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马克思和列宁也强调过:进步针对具体的状况具有转化为反动的一面。但是,这恐怕与基督教的末世思想有关。而马克思和列宁未曾强调的反动可以转化为进步这一方面,难道不需要更加强调吗?这样做更适合于亚洲的情况。如果不这样,便不会产生对甘地的积极评价。这里,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作为参考,也有必要对康有为的内部转化说做进一步思考。

七,日本式的进步主义不仅与进步无关,与反动亦无缘。因此,由此难以产生出创造性的能量。

#### 参考文献

- 《现代史讲座》别卷《战后日本的动向》中的共同讨论(一九五四年,创文社)  
上原专禄著《世界的观点》(一九五七年,理论社)  
猪木正道著《日本的方向——抵制反动》(一九五三年,创文社)  
《现代亚洲史》第四卷《世界史中的亚洲》(一九五六年,大月书店)  
《世界史中的亚洲——历史学研究会一九五三年度大会报告》(一九五三年,岩波书店)  
罗津纲编《现代亚洲之展望》(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译,一九五三年,岩波书店)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下卷(一九五七年,未来社)  
岛恭彦著《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一九四一年,生活社)

小岛祐马著《中国的革命思想》(一九五〇年,弘文堂)

诺曼著《日本的士兵与农民》(陆井三郎译,一九四七年,白日书院)

《亚洲政治经济年鉴》(一九五六年,国际日本协会)

一九五七年七月